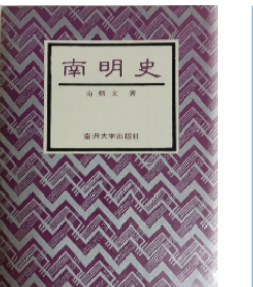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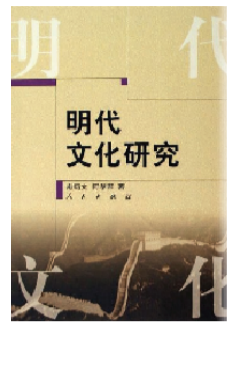


勤奋刻苦、淡泊名利的明史学家

——记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南炳文先生



何孝荣



南炳文先生的学术代表作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耄耋之年的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南炳文先生老当益壮,如今依然每天前往办公室,从事十几个小时的明史研究工作,熟悉先生的人无不被他勤奋刻苦、淡泊名利、平易近人的精神品格所感动。

南炳文先生1942年出生于河北省农村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1961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当时南开历史系师资力量雄厚,郑天挺、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杨生茂等著名史学家都在这里执教。年轻的南炳文先生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功课,课余时间不断向各位老师请教,并在他们的指引下逐渐走上历史研究之路。大学毕业后,南先生于1968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71年初调回母校历史系。其后,他又被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与修订《中国通史》明代部分陈列大纲和目录。1974年,他回到南开大学,先后在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历史学院工作,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

早在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之初,受到系主任郑天挺先生影响,南先生就选定明清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60多年来,他严谨勤奋治学,著作等身,尤其在明史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贡献,先后出版《明史》(上、下册,合著)、《南明史》(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清史)(上、下册,合著)、《明清史》(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清史)(上、下册,合著)、《明清史》(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清史)(上、下册,合著)、《明史》(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清史)(上、下册,合著)等30余种著作。其中,百余万字的《明史》(上、下册)作为首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明代断代史巨著,先后获得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在学术界具有极大影响,该书及南先生作为主编之一的《清史》(上、下册)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断代史”系列丛书,多次再版、重印;《辑校万历起居注》《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均获得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南先生目前担任国家重点工程“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之“明史”修订主持人,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史》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致力于明史基本资料的整理工作。

津派文化与近代化(十一)

对外贸易与近代天津

万鲁建

第八位;1893年升至3.63%,位居第五位。开埠之初,天津的进口洋货第一位是鸦片,其次是纺织品。19世纪80年代以后,鸦片的进口量逐年下降,纺织品占据进口商品之首位,1892年占天津直接进口口的三分之二,成为支柱产业。这一时期糖也成为主要的进口商品。出口商品主要是豆类、猪鬃、皮张、羊毛、杏仁、枣类、鹿茸、药材、草帽等。进入20世纪以后,品种增加到50多种,但仍以消费品为主。

“庚子事变”后,天津对外贸易迅速增加。1904年,天津港的直接贸易就已经超过间接贸易。1906年,天津港的对外贸易就突破了1亿海关两,高达11286.5万海关两。可以说,天津的贸易获得了长足发展,进出口货值很高,仅次于上海。以前外国商品大都以上海为中转站,即经上海商人之手转运到天津。从1905年开始,从欧洲和美国过来的各种货物直接运入天津的日渐增多。与此相反,来自上海的输入逐渐不振,1906年与1905年相比,实际输入额减少了400万两。1905年,1906年,天津的对外贸易额之所以出现超过1亿两的规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日俄战争所带来的影响。正如1907年《天津贸易年报》所说:“天津的贸易额都超过了一亿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主要是因为日俄战争后特别情况,呈现出了一时的膨胀而已。”该报告还看到未来天津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危机,报告写道:“原来基础薄弱之商人,一旦遭遇银价变动及农作物歉收及其他一般财界之悲剧,马上就会陷入困境。进入1908年以来,市面上就会陷入困境,向清国商人赊销货款累积巨万,但毫无收

中,有段署名互让的学界佳话广为流传。1979年,南先生和汤先生接受上海人民出版社约稿,撰写断代史《明史》,分工是明朝前期由汤先生起草,中后期由南先生起草,最后由南先生统稿。因此,书稿的作者署名是南先生在前,汤先生在后。1985年,《明史》上册出版前,南先生收到清样后,马上联系出版社,要求将汤先生改署为第一作者,自己为第二作者。出版社编辑大为不解,说您承担了此书的主要撰写工作,本应署名在前,但南先生坚持要改,说汤先生是前辈,而且职称晋升问题尚未解决,因此作者署名须改为汤前南后。《明史》上册出版后,参加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奖,汤先生遂给评奖委员会写信,要求如果评上,奖状一定要将南先生名字放在前面。到1991年《明史》下册出版时,汤先生又写信给上海人民出版社说明情况,务请署名顺序改回来。这样,《明史》下册作者署名为南前汤后。到了2003年该书再版,两位先生还在为署名先后互相谦让,终于各退一步,接受了上册南前汤后,下册汤前南后的方案。有编辑感叹,在出版界待了半辈子,少见南炳文式“争后”的事例。

《清代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是南先生当年带领留校工作不久的硕士生李小林(现为南开大学教授)和李晟文(现为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教授)撰写,南先生的内容占大部分,而且他承担了指导、修改任务,但出版时作者署名是“南炳文、李小林、李晟文”。《明代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为我读硕士时,在南先生带领、指导和修改下合作写成的,我撰写的內容只占一小半,但出版时作者署名为“南炳文、何孝荣”。2016年,经我提议和联系,南先生决定对《明代文化研究》《清代文化》加以修订,并增补近代文化部分,合成《明清文化通史》书稿。该书出版前,南先生又几次与我商议,要把我署为并列主编,为我婉拒。但是,最终他还是坚持将我同李小林教授署为副主编;而稿费按分配比例一视同仁地按署名人所承担部分的字数计算。

对于研究生发表的论文,南先生也拒绝署名。我于1992年6月硕士毕业后,将

学位论文《高攀龙政治思想述评》再加修改、压缩,投给《南开史学》,主编陈振江教授安排在当年年底的第2期发表。考虑到论文经过导师南先生的指导、修改,因此我将南先生署为第一作者,我自己为第二作者。当时,南先生在日本讲学,不知道此事。等他回国后,看到《南开史学》样刊,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严厉地批评了我,说他只是做了导师该做的事,不能掠人之美,不该在论文上署名,并反复叮嘱我以后不许再这样。南先生先后指导硕士、博士、博士后近百名,同学们在校期间的学位论文和其他的专业论文大多经过他指导、修改乃至推荐发表,但论文发表时,南先生都不允许学生署上他的名字。

南先生平易近人,没有学者专家的架子。对身边的每一人,甚至包括办公楼的保安、保洁人员,他都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礼貌周到地问候,还经常停步和他们唠家常。那些保安大叔、保洁大姐也都与南先生很熟悉,提起他无不竖大拇指。有时我们骑车在校园内遇见南先生,他也一定主动下车跟在我们身边。与同事、同行、朋友、学生见面,他表扬和肯定对方的成绩和进步,鼓励有加。谁有困难,只要跟他说起,他一定会热心地提供帮助,非把困难解决不可。访客告辞时,他不论是在自己家,还是在办公室,必定坚持送客下楼出门。每次大家不让他送下楼,他总是说第一次来,要送下楼,以后再请就不送了。其实后面同事、同行、朋友、学生再来访,他仍会坚持送下楼,直到看着对方离开才回身进门。

南先生知识渊博,与同事、同行、朋友、学生谈话时,往往能将相关的历史名人、事件、典故等顺口“拈出,用幽默风趣的语言联系起来,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对方的距离。学生们初见南先生时不免紧张,他总是笑盈盈地看着对方,幽默地说道:“我又不是老虎,紧张什么。”风趣的话语使学生的紧张感顿时化为乌有。前文提及的李晟文攻读硕士之初,多次见面南先生后,仍不免紧张。南先生每次都是笑吟吟地安慰他,有时还会学他拘谨僵坐的模样,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缓解他的紧张情绪。南先生上课时,也能用生动幽默的语言,把枯燥难记的历史知识讲出来。如他在为硕士生们上“史科学”课时,讲到清代的一本书《贩书偶记》,说:“作者是个摆书摊卖书的,在卖书的过程中把读书心得记录下来,形成了这本书。所以,他的名字虽然叫孙殿起,但他不是从宫殿里起来的,而是从旧书摊上起来的。”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同学们也被逗得哈哈大笑。三十多年后,有同学仍然清楚地记得课堂上南先生讲的这个知识点和他当时的神态,至今难以忘怀。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学人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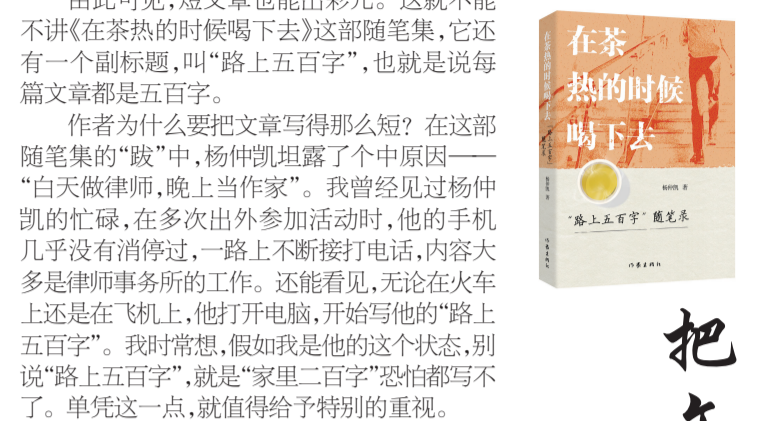
南炳文,1942年生,著名明史学家,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明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天津文史馆馆长、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历史研究所所长、天津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常务副主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兼任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立命馆大学、东洋文库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官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学术代表作有《明史》(上、下册,合著)、《南明史》(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清史)(上、下册,合著)、《明清史》(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清史)(上、下册,合著)、《明史》(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清史)(上、下册,合著)等30余种著作。

在天津作家杨仲凯的随笔集《在茶热的时候喝下去》时,我总是由自主地联想到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想到他的一句话小说——“当他醒来时,恐龙依旧在那里”。这篇12个字的小说,既有情节又有细节,在给读者带来无尽遐想的同时,也为微型小说也能成为优秀小说,做了一次最好的证明,使得“短”与“长”,都能成为文学跷跷板上的两极。

长篇巨制是衡量一个写作者写作高度的标杆,这早已成为文学界的共识;但绝不能因为有这样共识的存在,而忽略短小文章的价值。还是举例奥古斯托·蒙特罗索,他出版过微型小说集《黑羊》,里面每篇文章都非常简短,多是几百字,最长也不过千字,但是读后令人有着痛快淋漓的“长篇小说”的享受。世界文坛并没有因为蒙特罗索写得短而对他有任意的藐视,相反,蒙特罗索是一位广受尊敬的作家,马尔克斯、略萨、卡尔维诺以及波拉尼奥,对他都有极高的评价。

由此可见,短文章也能出彩。这就不能不讲《在茶热的时候喝下去》这部随笔集,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叫“路上五百字”,也就是说每篇文章都是五百字。

作者为什么要把文章写得那么短?在这部随笔集的“跋”中,杨仲凯坦露了个中原因——“白天做律师,晚上当作家”。我曾经见过杨仲凯的忙碌,在多次外出参加活动时,他的手机几乎没有消停过,一路上不断接打电话,内容大多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还能看见,无论在火车上还是在飞机上,他打开电脑,开始写他的“路上五百字”。我时常想,假如我是他的这个状态,别说“路上五百字”,就是“家里二百字”,恐怕都写不了。单凭这一点,就值得给予特别的重视。



无论是长、中、短篇小说还是小小说,语言、细节、情节以及结构,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绝对不会因为字数少、篇幅短,这些要素就不存在,就可以完全忽略。从某种方面来讲,短文章似乎更能考验写作者的功力。

《在茶热的时候喝下去》一共有172篇短文,在杨仲凯的严格界定下,如何在五百字的篇幅里,升腾起思想与艺术的光芒,考验着写作者的心智与胆量。还有一点,因为这是一部主体性极强的随笔集,又加上五百字篇幅的限制,导致在字数上没有一点纵深之地,因为又需要作者直抒胸臆,所以稍微不注意就会露出破绽。

另外还有一点,杨仲凯不仅界定了字数,还界定了书写内容,完全都是日常生活。虽然有着律师职业的独特性,洋洋洒洒起来绝对可以有高深莫测,让你摸不着边。但,杨仲凯不做高深状,他要用平实的语言,记录下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且用“我”的观照来独特呈现,从平凡之中显露出一丝思想的亮光。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重中之重。优秀的文学作品,语言也一定是优秀的。作者深知这个道理,因此他的172篇“五百字”,皆是语言精练之作,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在语言凝练的基础上,作者还特别注重细节的重要作用,常常把“细节”当作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关键。譬如《说拍照》这一篇,从“很多人喜欢拍照”说起,说到相机时代,直到手机拍照时代,最后再说到将来或普及的无人机拍照。假如只是罗列,意思不大,作者在这里“点”到了“自恋型”的拍照。这个微小“细节”,说明了拍照“灾区”在哪里。

思想是短文章的重中之重。没有思想的“短”,可能仅仅是“短”,只有拥有了思想的“长”,“短”才能显得弥足珍贵。《失去的时间夺不回来》这一篇,无论是思想性还是写作手法,都非常值得细细推敲。“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对于经历过那段特殊时期的人们来讲,这是再熟悉不过的一句话,因为说得太多了,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常识,似乎很少有人反思。杨仲凯呢,反其道而行之,他从逻辑角度来看,并用最普通事例来说明,“过去就没了,时间又不是一个被对方抢走的篮球,是夺不回来的”。随后,他又举例,所谓的能夺回来,可能是指通过提高效率的办法夺回来。“比如两天能够做好的事,一天就把它做好”。但其实是夺回来的已经不是时间而是成绩。最后表明,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在哲理之上,又有着日常生活中的“庸常之乐”。作者始终没有讲大道理,说的都是人之常情,说的都是朴素的哲理。

逆向思维是杨仲凯写作“路上五百字”的“独门秘诀”。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讲,好的情节,一定是下一个情节对上一个情节的背叛。也就是说,你不能顺着一个个情节走,一定要转向才能精彩。

出版过长篇小说和长篇虚构小说的杨仲凯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即使写作“五百字”的微型文章,也懂得运用这个写作手法。起码从他的人题开始,就已经运用了写作手法。《七天长假的隐喻》一文便是这样逆向思维的体现。

在大多数上班族的心里,长假休息七天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杨仲凯的文章上来就说“一旦到放长假时,就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我不知道,无论怎么安排,都会让人感到遗憾”。在讲了众多休息方式之后,作者发出感慨:“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天长假好像是人生的隐喻。”如此简洁的表白,让一件大众非常熟悉的事情,上升到了人生思考的层面。

《越橘越圆》也是一篇颇具哲理性思辨的文章。从“我”还是小孩子那会儿上美术课画杯子讲起,画杯子不像的原因,是因为把杯子画成了一个平面的圆。美术课老师告诉“我”,只有把杯子画成椭圆形,才能够“越橘越圆”。从小孩子的故事开始,又讲到了启功先生的书法视频,再说到“横平竖直是错误的,横要是想好看,就得写得斜一点”。又说了表演,最后发出“画起来难,但是最终看起来,还是一个圆,不就是一个圆吗”的无限感慨。

在五百字的篇幅里闪转腾挪,实在是不容易,也就是犹如评论家们常讲的那样,写精短文章就是在“针尖上跳舞”,好在杨仲凯通过他的“路上五百字”,做了一次如何在“针尖上跳舞”的有效尝试。

无论篇幅是否长短,只要能够写出人生境界与人生思考,写出庸常生活中的朴素之美,那就是一篇优秀的文章。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只要写得足够好,任何创作都应该引起重视,中外文学史上的大多事例已经说明。把文章写得短些、再短些,不仅能够节省别人的时间,也能翻阅你的思考深度与写作才能,杨仲凯的《在茶热的时候喝下去》,就是在亲身实践这样的道理。

满庭芳

李叔同水彩画片征集经过

崔锦



近日,天津博物馆联合天津市文物博物馆学会推出“十件文物中的天津”网络投票活动,遴选出十件代表性文物,邀请网友投票,从中选出三件心目中的津门记忆和标识。这些文物中,李叔同《明信片上的风景》水彩画是我征集来的,透过时间的隧道,追溯一下上世纪60年代初的往事。

这件明信片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叔同从日本寄给徐耀廷先生的。徐耀廷(1857—1946)又名药庭、月亭,祖籍河北盐山,世居天津,曾任李叔同家画达钱铺会计、亦善书画、篆刻,是李叔同早期学书画、刻印的老师。

明信片正面画的是一幅水彩画《津门风景》。画面中,在光的照耀下,海水呈现一线白光,稻田为黄绿色,斑斓的色彩和随意的笔触组成一幅多姿多彩的画,把津津的山、海水、树木、田野描绘得异常动人。这幅画可谓我国早期水彩画的代表作。

明信片的背面,李叔同写道:“津,日本东海道之名胜地,郊外多松柏,因名其地曰本松原。有山耸于前,曰爱麓,山岗中黄绿色为稻田之将熟也。田与山之间有白光一线,即海之一部分也。乙巳十一月用西洋水彩画法写生。奉月亭老哥大画伯一笑!弟 李叔同 寄日本。”

徐耀廷祖孙三代一直珍藏着李叔同的这件作品。徐耀廷之孙徐广中先生,曾在某暖厂任设计师,当年生产的铁皮暖瓶主要是送给新婚夫妇的礼品,别的设计人员往往画牡丹等鲜艳明快的图案,很受群众欢迎;唯徐广中设计了一款墨竹图案的暖瓶,雅倒是雅,但一件也卖不出去。后来,徐广中被下放当了工人,为了生计,他只好将其祖父所存的李叔同信件及这件《津门风景》明信片陆陆续续转出,原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因缘分收集到这件珍贵的艺术品。

把文章写短些再短些

武敏

第五三二期